

游牧移动与定居：从蒙古族传统游牧立场出发①

吉田顺一

(日本早稻田大学, 日本 东京 162-8644)

摘要：本文以新巴尔虎人的游牧本来面目为切入点，真正改变以往的视角，进行必要的斟酌，进而重新认真审视除了新巴尔虎人以外的其他不落在草原上进行传统游牧的合理性，就 21 世纪的游牧方式，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探讨。

关键词：游牧文明；移动；定居；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拟定

19 世纪以后，欧美探险家及后人们相继来到蒙古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仅仅以过客的身份看到了游牧文明的皮毛肤浅，但归国后却以满是理解的口吻不断言传和书写着他们所看到的一切，认为蒙古游牧文明是原始的和落后的。就连 20 世纪初对自治蒙古国进行调查和分析的俄罗斯学者 **マ イスキー** 也不无例外地把蒙古游牧文明称为“原始的畜牧”，认为是“自然与偶然”的产物。^[1]

对蒙古游牧文明的批判的或否定的这些看法，不仅局限于外国人，蒙古人中也有不少人持有这种观点，于是便出现了“被自然的力量所支配，不适应现代要求”^[2]、“多年以来，蒙古国之所以没有坚强的物质后盾，是因为一直被落后的游牧所支配”^[3]等等说法。

这些看法的背后似乎有以欧美流派的畜产判断为基准的背景，但若仔细推敲，不难发现，在他们眼里，蒙古游牧是对自然界的愚弄，且是偶然的和任意经营的、原始的和落后的游牧。

那么，是否要全盘接受对于蒙古游牧的上述评价，还是有必要听取蒙古牧民们的心声，或是有必要了解他们（牧民对游牧）的内心和智慧呢？笔者认为，重中之重是必须听取和了解他们的心声和智慧。基于这种立场，笔者欲探讨上述评价的正确与否，以作本文的议题。当然，本文所讨论的仅仅是一小部分，有关此问题，将在以后另作探讨。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1950 年末开始实行畜牧公有制，建立了畜牧作业集团化的人民公社（牧农协同组合），推行社会主义游牧生产。与此同时，囊括游牧“现代化”和以此为目的的种种政策也相继出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牧场改良和饲料栽培、干草的积极利用、牲畜的品种改良、畜群圈舍建设、打井、提高畜群卫生等均被纳入计划经济议程，得到了逐渐贯彻和落实。^[4]

就这些政策所实施的结果，本文不作探讨。笔者所要探讨的是，这些政策是否为了与上述的批判和评价形成对应；是否为了摆脱所谓的“愚弄自然界、且是偶然的任意经营的、原始的和落后的”现代游牧而出台。

同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了实现游牧“现代化”，为了提高游牧的固定性和加强牧民的定居化，曾进行探讨，甚至还出现了为此提供具体方案的专家。^[5]即使是经过了人民公社编组完成后的 30 年，专家们针对放牧的固定倾向所提出的谨慎的预测、意见仍有着一定的说服力。^[6]不管怎样，传统的蒙古牧畜是游牧的，而游牧就是通过不断移动牧场来饲养牧畜。然而，引导牧民进入游牧固定化、使其定居、抑制游牧本性所具有的移动的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是强行改变游牧本质的行为。蒙古国的言论虽然没有把游牧“后进性”完全归咎于移动游牧，但是他们当时推行新政策的初衷，确实是以实现游牧固定化为目标的。依据这种做法，如果真的实现了游牧固定化，那么毫无疑问，以

移动为本质的游牧原有的牧场利用方式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上世纪 90 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人民公社解散，继蒙古人民共和国之后成立的蒙古国，并没有组织进行针对牧民定居和游牧固定化的政策，而是让牧民进入了放任的状态。但是，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在蒙古国也曾有人主张对原有的牧民共同的牧场进行分户。

与此相对，上世纪 80 年代上半叶，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公社解体后，积极推行牧场细分到户的政策，不容游牧与否地走向固定化，悄然进入了蒙古游牧定居化的新阶段。目前很多人认为，游牧在内蒙古自治区已经不存在了。而我认为，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当然对于今后事态的发展和牧场分割进程的影响等，有必要进行慎重的观察和跟踪调查。^[7]

如上所述，具有 3000 年游牧历史从未面临过重大的变革即固定化问题。作为游牧文明的研究者，对此不能没有浓厚的兴趣。正因为处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所以有必要试着了解蒙古牧民自身对传统游牧的认识和牧场利用所包含的内在意义。这种认识，对探讨本文的主题，即关于蒙古游牧的低评价的正确与否、与游牧本质息息相关的移动为焦点进行剖析时会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二、蒙古国传统游牧和人民公社时期的游牧移动

如今，已很难准确把握以往的游牧轮廓。然而，就上世纪 50 年代末，游牧向社会主义转化时，不论是在蒙古国还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可以说还保持着近乎于传统游牧的自然状态。

当然，虽说是传统游牧，但蒙古高原所有地域也并非千篇一律。以牧场利用为例，体现牧场利用特点的四季牧场，尤其是冬、夏季牧场的配置和牧场间的移动距离的长短、移动数的多少等也因各地区的地形、牧草、水源等状况而不尽相同。这种相异亦可称之为牧场利用的地区性特色。以山岳森林草原渐广的蒙古国北部山岳地带和主要位于西侧的由高山和大的盆地形成的西部山岳地带的传统移动（游牧移动）为例，前者冬季牧场选在山谷的上方，夏季则选择比冬季牧地较底的平坦山谷。这种地区在蒙古国属于多雪地带，因为雪可以被风吹走，所以积雪较少的山谷上能成为理想的过冬牧场。后者，则是把冬季牧场选在山麓或比山麓略高之处，夏季牧场则选在山高之处。根据相关的调查记录，前者的年间移动数在 10 次以下，移动距离在不多于 20 公里的范围之内（以下的移动次数和移动距离均以年间为准）^[8]，而关于后者的移动次数虽没有具体的报告数据，但关于移动距离却有报告显示约达到 200 公里或更多。^[9]除了上述两种地形外，在戈壁和东部平原地区的移动次数和距离也有差别。然而，只分上述四种地形，显然不很全面。因为每一个地形里也包含着具有若干特色的地域。^[10]在谈到牧场利用时，对类似的各种地形不能有笼统的概述，而是有必要对构成每一个地域的各个地形进行逐一的和正确的探讨。（见图 1）

以上是人民公社时期，以游牧固定与牧民定居为对象所实施的政策情况。然而，关于政策实施之后的落实程度，即对游牧固定程度进行调查时，笔者认为，如前所述，必须掌握由于不同牧场利用特点而形成的不同地域情况。当然，这种方法多少有些难度，所以也可采取从各个地域传统游牧的牧场利用情况着手，之后对这些地域每个地带的牧场利用沿革进行正确的探究，再对两个不同时期的每个地域和地带的状态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前后变化幅度的方法。只有测定、跟踪和衡量其变化，才能准确地得出每个区域的牧民移动次数和距离。例如，Jagbaral 认为，人民公社时期即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半期，虽然进行了 bilcheer（自然牧场）的改良、饲料的种植和其它改善措施的新式畜牧移动，但正如预料，比较于利用自然牧场的传统畜牧，认为定居并非进步，指出牧民也移动了很多次。也就是说，把移动的次数和距离当作了衡量过度到定居化的标准。诚然这是粗浅的衡量法，但用这种衡量法计算，以 1973 年为例，组成人民公社的若干畜牧单位（当时称之为“suur”，汉译为“营盘”）平均每年移动 9 次，移动 164 公里。当时，移动最为频繁的是乌布苏（Obsu）省塔日雅楞（Tarialan）苏木的牧民，移动次数达到每年平均 36 次，移动距离超出 1001 公里。^[11]

总之，在 Jagbaral 看来，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尽管经历了十几年，人民公社化已经完成并实施了各种政策，但游牧的移动次数和距离并没有象所预料的那样减少，固定化也没有得到进展。笔者认为，作为衡量固定性（游牧固定）的尺度，Jagbaral 只所以选择牧民的移动次数和距离，是因为就草原地带的游牧来说，移动有了本质上的意义才是正确的。

通过以上调查，笔者深切地体会到，当谈论蒙古的传统式牧场利用时，以移动问题为中心，进行探讨是尤为重要的。作为我的探讨对象，由于我曾经做过实地考察，而且文献资料也较为充分，

所以选择了蒙古高原的东部平原地带。

三、东部平原的传统式游牧与人民公社时期的游牧移动

蒙古高原的东部地带是广阔的纯草原式平原。该大平原的西部属于蒙古国东方省（Dorunatu ayimag），东部属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绵延至南北横断呼伦贝尔中央的大兴安岭西麓。虽然蒙古国方面称之为东部平原，呼伦贝尔方面又称其为呼伦贝尔高原或达赉（Dalai）高原，但因两处均为蒙古高原的组成部分，所以亦可将二者看作一体，故称作蒙古高原东部平原或东部平原也无不妥。（见图1）

这一带的居民，蒙古国方面主要是蒙古系的喀尔喀（Qalqa）人，而呼伦贝尔方面则以蒙古系的巴尔虎（Barhu）人和通古斯系鄂温克人等为主。首先，蒙古国方面的主要居民喀尔喀人传统式的牧场利用情况，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多见。笔者1998年夏、秋前往位于东方省中部的乔巴山苏木进行了调查。据71岁老人的陈述，人民公社以前，他们家族的游牧移动北至包括位于苏木中心西北方向直线距离40公里的雅金湖北侧的牧场，南至位于苏木中心南方直线距离30—40公里，拥有沿克鲁伦河的牧场的广阔空间。雅金湖附近为冬牧场，南侧为春牧场，而克鲁伦河附近为夏季牧场。也就是说，春天离开冬牧场，南下至夏季牧场，秋天北上返回冬牧场，年年如是，周而复始。每年间的移动距离大约为150公里左右。据说，移动次数也比较频繁，每年达到30—40回次（见图2）。据对东方省的两个苏木（公社）的牧民在人民公社时期移动情况的调查显示，当时在蒙古国，他们的牧畜移动距离也比较远，移动回数由西部山岳地，带依次频繁。[12]即在乔巴山苏木附近，据对位于其西侧的查干敖包苏木和北侧的达希巴拉布尔苏木的调查显示，前者的移动回数为21回，移动距离大约150公里，而后者的移动回数为11回，移动距离为100公里左右。[13]（见图2）根据Jagbaral的调查，1973年，东方省的牧民平均每年移动11回，移动距离为156公里。[14]在人民公社时期，同一省的运动情况与传统游牧的移动距离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而移动次数在人民公社之前略多一些。

在中国的呼伦贝尔盟地区，就牧民的牧场利用情况，可根据二战时期日本人的调查，进行更详细的了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34年9月满铁经济调查会对新巴尔虎左旗进行的畜产调查和1938年末至1939年满洲国兴安局调查科对呼伦贝尔盟进行的牧野及放牧惯例调查。②

1945年11月，以新巴尔虎左旗人为主的大约1000名巴尔虎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该国为这群人在东方省的西端迅速成立了呼伦贝尔苏木。[15]为了对参加此次移居的和现住居民进行调查，同时为了确认战前日本人所进行的调查结果，笔者曾于1998年和2000年对上述地区进行了调查。当时便采访了Chombyn Norob（80岁）、Tseyenpeljeghin Charmaa（79岁）二人（1998年时）和Lkhamaajavyn Ad'yaa氏（2000年时79岁）的老人。他们在东方省移居之时，在其20多岁之后，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之前，已经积累了在新巴尔虎左旗游牧的经验。

以下，根据从三位老人处得到的资料和蒙古人所著文献以及日本人对上述情况的调查报告资料，以新巴尔虎左旗人的传统的牧场利用情况和移动问题为中心进行阐述。

根据呼伦贝尔苏木老人讲述，在蒙古族中，他们恐怕以移动次数多而闻名。除了接羔的春季以外，频繁地进行移动。1年间移动次数多则50-60次回，少则也有40回次。据兴安局的调查，新巴尔虎左旗的年间移动回数“50-60回次属普通现象”。此外，每月的一般移动回数为“1月、2月6-7回；3月、4月5-6回；5月3-4回；6月2-3回；7月4回；8月5回；9月5-6回；10月6-8回；11月7-9回；12月7-8回”。[16]由此可见，新巴尔虎左旗牧民的移动回数确实频繁。

移动回数频繁，移动距离就会相应变长。事实上，新巴尔虎左旗牧民的移动中有很多长距离的移动。从兴安局调查科及满铁经济调查会的调查结果来看，他们一直在进行类似的长距离移动。其范围为，夏天在Orcon河、达赉湖东岸及在甘珠尔庙周围牧场游牧，而冬季则在遥远的南方Menengiyn tal平原和bogd uul（在达赉湖南边40公里处，以敖包著称）山一带游牧，最终到诺门罕（贝尔湖东侧）一带。Menengiyn tal平原是从贝尔湖西边的新巴尔虎右旗南端起头，跨越国境南下延伸到东方省的广袤平原。这里植被良好。根据满铁经济调查会《新巴尔虎左翼旗畜产调查报告》的附图《新巴尔虎左翼旗放牧经路略图》（见图3），牧民们为了在Menengiyn tal平原过冬，非常清楚该平原由贝尔湖西端南下的地貌。到贝尔湖西端的牧场，直线距离也不过100-150公里多，年间的往返距离为200-300公里之多。从贝尔湖西侧南下，国境附近，时常有牧民越过南方在此游牧。至今仍有民

谣证实，其中也有不少牧民度过喀尔喀河南端离开蒙古国，一直南下到今内蒙古自治区东乌珠穆沁旗萨麦（Samay）苏木的平原（见图 1）游牧。从达赉湖东岸到萨麦苏木，直线距离最多超不过 300 公里。所以往返距离应该远远超出了 600 公里。

如上所述，新巴尔虎左旗牧民，曾经进行着非常长距离和多回数的游牧移动。如同他们中的老人陈述的那样，在蒙古高原牧民中他们移动的回数和距离恐怕是最远的和最多的。

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新巴尔虎左旗牧民在每一季节对牧场的利用情况。在此之前需澄清三个问题。

第一，以下所要论述的巴尔虎人的移动，是与羊群（包括山羊）饲养有关的移动。巴尔虎人饲养着大量的羊，所以羊群决定着牧民们的移动的基本方法。

第二，凡是同旗牧民进行长距离的和频繁的移动者，几乎是拥有一定羊群头数的牧民。这一推断，从那些老者的回忆，即“所谓的 Öböljöö（冬季牧场），是那些牲畜较少的户家才有的地方。一般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冬季牧场。因为，我们总是不断地移动”中亦可得到证实。

第三，二十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根据满洲国的政策，在草原上星罗棋布地建立了很多定居点（tosghon）。

新巴尔虎左旗的牧民，从 3 月末即幼畜繁殖时 [17]，进入 Khabarjaa（春营地，每年使用的春营地并不固定），将近 30-40 日之间不再移动。只有在此时他们才会长时间停留在某一处。如同所记录的那样，“当幼畜繁殖结束后，在降雨之处进行较长时间的移动，或在草好的地方游牧”，或者“春天幼畜繁殖之时，并不进行长距离的移动，而是安顿下来，围绕有雪水的、青草能够迅速生长的和阳光充足且温暖的地区，或在干燥的、有青色的和黄色的草（buuts）的地区进行移动” [18]，这种移动恰巧是为了让羊群吃到 yarghuy（Pulsatilla Mill）和 manghir（A.senescensL.），以使其尽快增膘。

6 月 15 日开始剪羊毛，待剪羊毛结束后，即刻前往夏季 otor（夏季牧场，由家族中一名成员携部分牲畜，寻找水草丰美的草场，进行频繁的移动）。所谓剪羊毛，意味着春天的结束和夏天的开始。在夏季牧场（otor）期间，在某一处的停留时间不会超过 5 天。③没有固定的 namarjaa（秋季牧场）。不过有供秋天使用的区域。也有供夏天使用的区域。从夏天的区域移往秋天的区域，被称作 namarjaa buukh（入秋季牧场）。进入秋季牧场后，移动会变得很频繁，或 15-20 回次，甚至进行更多的 otor 移动，可以说几乎每天都在移动。秋季激烈的移动，一直持续到 9 月末。进入 10 月份后，将禁止牲畜长距离移动，而是在就近进行 buuts solikh（不更换牧场，而是更换宿营地的移动）。

到了冬季，没有固定的冬营地（Öböljöö），所以也就没有下冬营地（Öböljööndöö buukh）一说，开始进行逐水草的移动。由经验丰富的老者选择冬季的 otor 场所。④在整个冬季，即从 10、11 月份降雪至来年 3、4 月份的融雪期间，将进行 30 回次以上的移动。如前所述，根据日本人对每月移动回数的调查报告，亦可了解，从 10、11 月份至来年 3、4 月份间移动回数大体上接近 30 回的数据。有雪灾时，移动回数就可达到 40 回次。

遗憾的是如今无法了解人民公社时期的具体情况。笔者于 1995 年 1997 年走访新巴尔虎左旗，对 2 户牧民进行了调查。其中 1 名是人民公社时期管理水井的人员，另一名则是不了解人民公社时期牧畜情况的年轻人。所以关于移动的调查没有取得理想的进展。加之，该旗还没有刊行旗志。

四、新巴尔虎牧民传统游牧的牧场利用本质

新巴尔虎左旗的牧民，为什么如此热中于移动呢？首先，当春天幼畜繁殖结束后，进入春营地，为了让羊群吃到 yarghuy 和 manghir 而近距离移动。[19]这个被称作 noghoolokh（采食新鲜青草）。yarghuy 和 manghir 是长在一起的植物。此时，绵羊和山羊吃到的 manghir 属 tüükhiy manghir，其高度大约 4 指宽，即 6-7 厘米。绵羊和山羊连续 6-7 天食用 yarghuy 和 manghir，而不饮水，其体内的绦虫被杀死后会随着粪便排出体外。从 5 月 15 日到 6 月 15 日，寻求其它牧畜尚未吃到的新鲜嫩草，以使羊群增肉膘（khar makhan targha）。⑤所谓肉膘是指羊群经严酷的冬春两季后，靠吃新出嫩草，而增加的最初阶段的膘情。

夏天，剪羊毛结束后，把羊群赶到有河流的地方，让羊群每日 2 次往返渡河淌水，持续 7-8 天或 10 天，以防止羊群患有疥癣。在夏季牧场频繁移动，7、8 月份时开始让羊群增肥膘。进入夏季

牧场的所有牧畜，都要完成这一过程。肥膘是指肉膘后的另一个增肥阶段。牧畜若没有达到肥膘的阶段，平安越冬将会很困难。可以说增肥膘是夏季游牧的目的。夏季牧场，在某一处的停留时间，不会超过 5 天。因为，在某一处停留时间超出 5 天，每日吃惯新鲜草的畜群，就会变得不再悠闲地吃草。在夏季，让羊群吃到草汁丰富的 manghir、taana、ghoghol/ghoghod 等草类，每周只饮水一次即可。青草、manghir 和 taana 对羊群大有裨益。“通过 manghir 和 taana 获取水分”，也就是说 manghir 和 taana 可以替代水。

夏季的移动一直持续到秋天幼畜和母畜分开为止，即持续到 8 月 15 日左右。可以说幼畜和母畜分开之时，便是进入秋季牧场之时。在秋季，寻找草好的牧场，选择长有 manghir 的地方过夜，翌日再移动。这就是所谓的秋季畜群增膘移动。也就是“让畜群吃到枣、榆、柳等树种的叶子，以此来巩固肥膘。在长有 Agh’、taana、khomol、temeen suul 等草类的地方，或沿着长有象 manghir 一样草汁丰富的草类的丘陵地带放牧”。[20]秋季移动放牧的目的就是让畜群增加肥膘。

冬天，牧场有种类繁多的草当然有益，但长有大量 agh’ 和 bod 的牧场对畜群更有利。牧民们非常重视让畜群吃到此类草富有营养的顶尖部分。目的在于让畜群在没有被其它畜群吃过的、没有被踩踏过的牧场吃到更好的草类。

此外，如果不进行日常牧场的更换移动，即 nutag solikh，畜群就会很容易患上疖癣和口蹄腐烂（doghol）。

新巴尔虎左旗牧民，除了在春季繁殖幼畜时期以外，一年四季频繁移动，很显然这是为了在不同时期使畜群得到必要的饲养。综上所述：

- 1) 春天利用 yarghuy 和 manghir 驱除羊体内的绦虫；
- 2) 春天让羊群吃到其它畜群没有吃过的新鲜嫩草，以增加肉膘；
- 3) 夏季和秋季让畜群吃优质的草，以增加肥膘；
- 4) 经常在新鲜的牧场放牧，以使畜群能够悠闲的吃草，更好的增肥；
- 5) 冬季让畜群在没有被其它畜群吃过的地方，吃到富有营养的如 agh’ 等草的草尖部分，以防止其体力下降；
- 6) 防止畜群患上疖癣等疾病。

蒙古高原的游牧的根本是夏秋两季让畜群增膘，而在严酷而漫长的冬、春季尽可能地维持畜群的膘情。在寒冷的蒙古高原游牧，其最切实的问题就是在酷冷的冬季和草势最为恶劣的春季，如何使畜群特别是小畜（绵羊和山羊）平安度过的问题。为此，必须在草势良好的夏季和秋季尽量使畜群变得膘肥体壮（如上所述，必须经过每个阶段，即从肉膘到肥膘的阶段），而在冬春季节，尽可能地防止畜群变瘦，保持体能，一直延续到次年长出青草为止。⑥可见，牧民们正是为了这种目的，在饲养畜群时最为重视的是如 2) —4) 中所述般，通过频繁地移动，找到实现目的的途径。

除此之外，如 1) —6)，为了防止寄生虫和疖癣等疾病，也是通过频繁地移动。

总之，牧民们所进行的移动，看似忽略而不精心，其实并非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听之任之，或者象人们所说的那样让畜群任意移动，他们的移动恰巧是为了实现草原畜群饲养的根本目的而进行的。

五、新巴尔虎牧民传统游牧干草、畜群圈舍及小屋的利用

如前所述，可以说在人民公社时期，纳入计划经济体制所出台的畜牧政策，是以让“落后的”蒙古游牧进入“近代化”为目的而实施的。如前第一节中所述，人民公社时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游牧近代化政策所实施的内容中，特别是“干草的积极利用”和“畜群圈舍建设”两点，曾被列举为传统游牧不完善或不充分的标志，成为蒙古游牧原始和落后说的重要理由。同样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公社时期通过政府主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干草的贮存和畜群圈舍建设工作。于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自治区两个区域，引进大型割草设备和拖拉机等，积极地、有计划地进行了干草的贮存、分配和畜群圈舍建设。那么，新巴尔虎左旗的牧民如何看待上述两项内容呢？

首先是干草的贮存和利用方面。传统上，巴尔虎人没有采集干草（khadlan bordoo）的例子。在蒙古，冬春时期从多处搂草，供够幼、弱牧畜食用即可。在草多的地方，用镰刀割草，除了供幼、

弱牧畜饲养外，还饲养坐骑。^[21]在新巴尔虎左旗，沿海拉尔市至满洲里市的铁路，战前受俄罗斯的影响，也曾有部分牧民割草的现象。但这仅仅是局部，搜集冬季干草，仅供幼、弱畜饲养。也就是说，他们（巴尔虎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秋季集中打草后晒干贮存等活动。

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囤积干草的可能。主要是因为，一旦频繁地移动，打草等活动将会变得比较困难，搬运堆积的干草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变小。于是，他们时刻寻找良好的牧场放牧，也就没有必要依赖干草。之所以囤积普通干草，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雪灾等天灾时，为了弥补畜群食物不足而进行必要的囤积。而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们通常还是采取寻求良好的牧场，频繁移动的办法，尽量让畜群吃到新鲜的草类，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其次，有关从不建造和利用冬春用暖棚的问题。蒙古牧民从古以来，从来不建造畜群暖棚，但是他们会利用羊砖（绵羊和山羊粪堆积形成的固体物）、木板和石头建造羊圈加以使用。同样，新巴尔虎人虽然没有建造和使用过暖棚，但也有使用羊圈的例子。他们的羊圈由木料简单的组合而成，“当年幼畜稍微长大，便不在围圈羊群。此后，待冬天完全寒冷时，清除羊盘（羊群休息的地方）内的雪，（或者）迁往新的宿营地之际，清除积雪为止，不会圈养畜群。”^[22]夏、秋季节，一般不使用羊圈。

就这样，他们使用羊圈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且也不很温暖，但是只要羊群膘肥体壮，他们就不会使用石头或木板建造羊圈，换句话说，他们就不会考虑使用暖棚。不仅如此，他们认为，暖棚的使用会诱发畜群出汗，从而导致脱毛，反而会影响畜群的健康。

附言之，事实上新巴尔虎人对干草利用和羊圈的传统理解，并没有特异之处。笔者在蒙古国东方省及苏赫巴特尔省进行调查时，很多老人也都是这样认为的。

如上，新巴尔虎的牧民们之所以不使用干草和羊圈，是因为他们的游牧方法是基本不需要这些条件也能够顺利进行。所以，以不使用这些为例，断言他们的游牧是落后的结论显然是不妥当的。

如上所论，只要了解了新巴尔虎人的游牧情况，就会明了所谓提高游牧定居的做法与他们的游牧方法根本就格格不入。他们通过尽量移动的频繁游牧，满足畜群饲养的种种要求，而且一直以满足。如果抑制移动，他们的畜群饲养无疑会遭到重创。

笔者认为，如果以所谓的游牧近代化为名义，采取强行减少新巴尔虎人的移动，以提高定居化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但是，如果无视频繁移动所取得的种种现实成果，畜群饲养就会遇到诸多问题。于是，便会引发解决问题的种种必要，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采取各种必要措施的可能性。

六、结论

新巴尔虎人的游牧，与人民公社时期曾被设想而试图实现的、曾被近代化了的畜牧状况形成了对比，处于反面位置。就从这一点，新巴尔虎人的游牧很可能被称作最接近落后的和原始状态的游牧方式。然而，如上所论，事实上新巴尔虎人的游牧，是积极利用蒙古草原，根据羊群的移动本性，尽量进行频繁移动，从而形成适应羊群的最佳饲养方式的游牧。从这一点可以说，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蒙古游牧特征，而有着自己的积极性和合理性。蒙古游牧一直被认为是适应草原环境的产物，而所谓的“适应”其实含有很强的“顺应”之意。因此，这种评价与其说是积极了解蒙古游牧的基础，倒不如说这只不过是根据粗略的判断所进行的笼统的、消极的评价而已。笔者以新巴尔虎人的游牧本来面目为切入点，真正改变以往的视角，进行必要的斟酌，进而重新认真审视除了新巴尔虎人以外的其他不落在草原上进行传统游牧的合理性，有必要就 21 世纪的游牧方式，进行认真严肃的探讨。或许这就是本文见解中的可取之处，而这恰好也是我想要得出的结论。

另外，与巴尔虎人的游牧方式较为相似的乌珠穆沁人的方式也很引人注目。据我的实地调查显示，乌珠穆沁人对待羊圈及干草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理解，与巴尔虎人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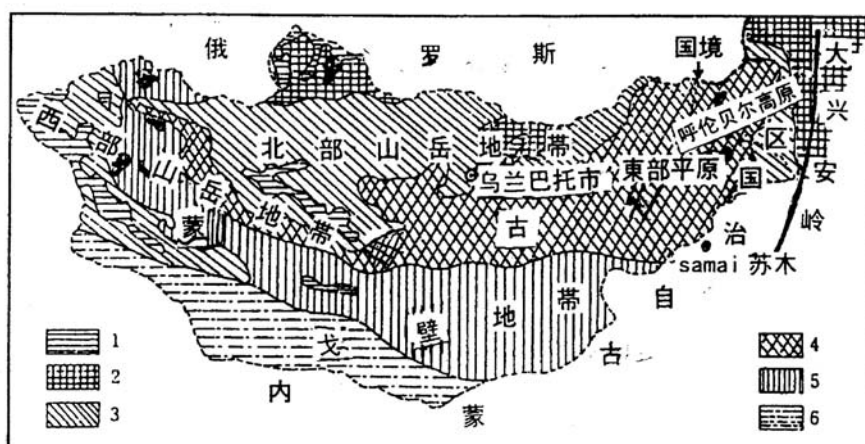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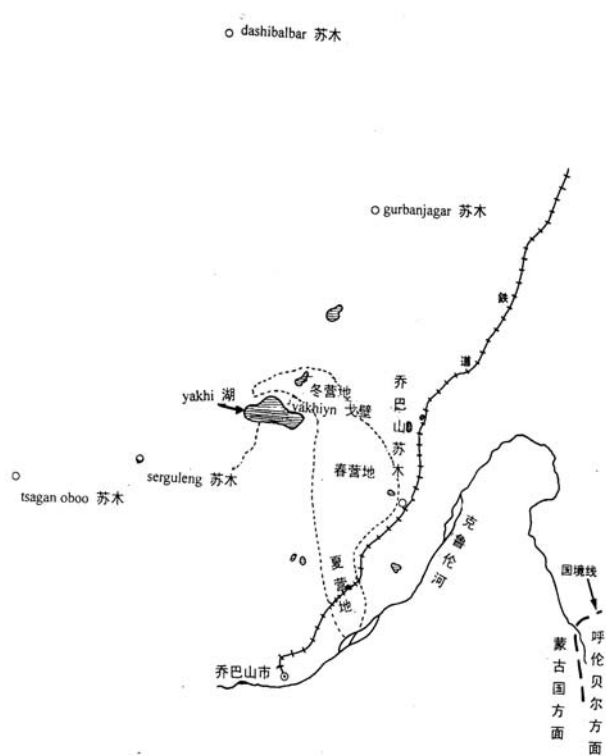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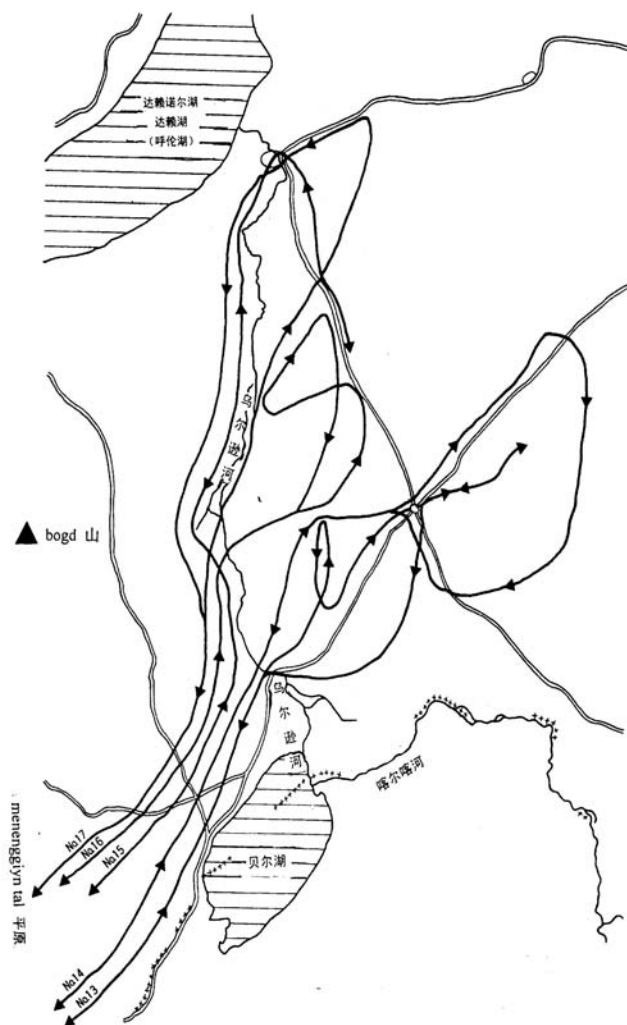


图 3

注释

①该文原载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蒙古研究论集，蒙古研究成果报告 I，东北亚研究中心丛书第 6 号，75—95 页。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包国庆译。

②满铁经济调查会对新巴尔虎左旗进行调查的最终成果是，昭和 10 年 11 月资源调查编纂书类第 4 编第 4 卷（续）刊行的《满洲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中收录的《新巴尔虎左旗畜产调查报告》（渡边勇 执笔）。其中重要的有 2 篇报告。一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落款为昭和 9 年 6 月经济资源调查报告书第八十二号兴安十七号畜产第五号的《新巴尔虎左旗畜产调查报告》（油印）。报告中有题为《新巴尔虎左旗放牧经路略图》的 3 张插图，图示了新巴尔虎左旗牧民的移动经过及线路情况。另一是，经兴安局调查科调查形成的《兴安北省牧业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40 年 12 月，兴安局调查科，522 页）。就上述 2 篇报告，由吉田顺一在《日本人在呼伦贝尔地区的调查—以畜产调查为主》（《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 45 辑，第 4 分册，2000 年 2 月发行）中进行了解说。

③根据牧场的情况，夏季的移动距离 5-6 公里，15-20 公里不等。

④“初雪后，在家族定居地留下辎重，轻装整理，开始秋季大移动（ikhūn nūūdel）。他们遵循初雪少降的地方，下次

的降雪也不会太大的规律，选择冬季牧场”。（Monggol Ulusyn ugsaatany züy 3bot', UB, 1996, p. 99.）这里所说的秋季大移动，也许就是指一直持续到9月末的频繁移动。而所提到的“冬季牧场”，可能就是指冬季使用的区域。

⑤Mongol Ulsyn Ugsaatany zuy 3 bot', p. 95 也记有相关情况。

⑥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是青黄不接时期。干草的养分从其枯竭之时开始逐渐降低，此时降到最低点。根据对杭盖地带的草的研究，如果把草的成长状态的养分设为100%，那么秋天90%、冬季75%逐渐降低，到春天时实际降到40%。（Mongol orny bilcheeriyn mal mallaghaany arga turshlagha, Ulaanbaatar, 1996, p.54. 吉田顺一《蒙古游牧的根本》，日本蒙古学会《蒙古研究》11号，1980年，42页）。

参考文献

- [1] 满铁庶务部调查课编. 外蒙共和国 [M]. 上编, 大阪: 每日新闻社, 昭和二年. 269.
- [2] 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 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经济历史某些问题 [M]. 乌兰巴托, 1976. 3; 蒙古国科学院历史所编著, 二木博史, 今泉博, 冈田和行译, 田中克彦监修. 蒙古史 [M]. 1、2, 恒文社, 1988; 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 [M]. 3 册, 第二卷, 乌兰巴托: 1969. 79、96、150 页等.
- [3] Tserengiyn Nasanbaljir. 蒙古国经济倾向传统与改革 (XIX 世纪末 XX 世纪初) [M]. 乌兰巴托, 1978. 6.
- [4] 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二木博史等译. 蒙古史 [M].
- [5] 蒙古人民共和国草原经济部, J-Sambuughiyn 畜牧经济研究院. 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经济纲领体系 [M]. 乌兰巴托, 1982. 4-5.
- [6] 吉田顺一. 对于游牧民的自然领有 (历史的自然领有 [M]. 岩波书店, 1989. 182-184.
- [7] 吉田顺一. 近代内蒙古畜牧社会研究 [M]. 平成十年度—平成十二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础研究 (C) (2)) 研究成果报告书, 2001 年 11 月, 第 4 章《人民公社解体后》; S·格日乐图. 过度放牧引发的社会过程—以伊敏苏木为例 [A]. 日本沙漠协会. 沙漠研究 11-1 [C]. 2001 年 5 月. 31.
- [8] 吉田顺一. 蒙古传统游牧的地域性 [A]. 早稻田大学东洋史恳话会. 史滴 5 [C]. 1984. 70-72.
- [9] 吉田顺一. 蒙古传统游牧的地域性 [A]. 早稻田大学东洋史恳话会. 史滴 5 [C]. 1984. 64-65.
- [10] 吉田顺一. 蒙古传统游牧的地域性 [A]. 早稻田大学东洋史恳话会. 史滴 5 [C]. 1984. 57-61.
- [11] N.Jagbaral. 社会牧区经济财政的若干问题 [M]. 乌兰巴托, 1987. 137-143.
- [12] 吉田顺一. 蒙古传统游牧的地域性 [A]. 早稻田大学东洋史恳话会. 史滴 5 [C]. 1984. 76-77.
- [13] G·Batnasan, “BNMAU daku'negdelchdiyn aj akhuyghaa khötölkh arga ajillaghaa”, *Studia Ethnographica* Tomus VI, Fasc.1, UB 1978, pp.50-52. 吉田、同上、77-78 页。
- [14] N. Jagbaral. 社会牧区经济财政的若干问题 [M]. 乌兰巴托, 1987. 142.
- [15] Ya.Shaariybuu, B.Namsray. Dornod aymaghiyn kh ölönbuyr sum üüsejbayghuulagdsan tukyay tüükhen temdegle (1945-1950on) [M]. UB, 1995. 11. [日译有吉田顺一 (解说及译)、青木雅浩、永井匠译《东方省呼伦贝尔苏木建设历史记录 (1945-1950)》(《日本与蒙古》第 33 卷第 2 号, 1999 年 3 月所收)。而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内蒙古大事记》(呼和浩特市, 1997 年) 中说此次事件的年代为 1945 年 8 月。(378 页)]
- [16] 兴安北省牧业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 [R]. 244.
- [17] Kharghana J. Öliyz. Bargha mongholyn tüükh [M]. UB, 1999. 249.
- [18] Monggol Ulusyn ugsaatany züy 3bot' [M]. UB, 1996. 99.

[19] Kharghana J.Ölziy.Bargha mongholyn tüükh[M].UB, 1999.250.

[20] Mongol Ulsyn Ugsaatany zuy[M]. 3 bot', 98.

[21] 梅棹忠夫. 打草蒙古 [A]. 梅棹忠夫著作集 [C]. 第二卷, 东京: 中央公论社, 1990.

[22] Kharghana J.Ölziy.Bargha mongholyn tüükh[M].UB, 1999. 250.

Nomadic mobility and settlement: from perspective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nomadic pastoralism

Yoshida Junichi

(Waseda University, Japan Tokyo 162-8644)

Abstract: This paper rethinks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of Bargu Mongolian, with a very different perspective from those that have been used in the subject, putting forward the reasonableness for Mongol groups to follow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in the Mongolian grassland, and inquiries in a strict sense into future for the way of life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nomadic civilization;mobility;settlement; reasonableness

收稿日期: 2005-11-25;

作者简介: 吉田顺一, 男,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研究院教授, 要从事蒙古史研究; 包国庆 (1972—), 男, 蒙古族,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办公室秘书。主要从事蒙古史方面的研究。